



# 不作惡，且苟活：何鳳山和他的“生命簽證”

文 / 二大爺

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往往是讓人難以逾越的鴻溝。每壹個或無法沈默、或慷慨激昂的正常人，難免都會經歷這樣的奚落：妳總是在批評那個不會下蛋的母雞，妳下個蛋來看看？有本事妳滾出雞籠？

我們是人，不會滾，顯然也無蛋可下。那麼，當妳面對悲憤卻又無力改變的局面，陷入焦灼而又不能熟視無睹的折磨，妳能做的是什麼？

民國外交家何鳳山先生在1938年納粹德國吞並奧地利的時候，任民國駐奧地利總領事。

當時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步升級，大批猶太人已被送入集中營。而留下的猶太人想要離開，又苦於拿不到簽證。因為在1938年的國際難民會議上，國際社會尚未認識到納粹種族滅絕政策的惡毒，普遍拒絕接受猶太難民。在這種艱難的形

勢下，無論是從考慮自身安危的角度，還是從服從職業要求的角度，何鳳山都可以選擇當壹個旁觀者。

但不願意見死不救的何鳳山思慮再三，不顧上司的反對，在維也納領事館向數以千計的猶太人發放了前往上海的簽證。壹個簽證就可以拯救壹條人命，因此這些簽證也被稱為“生命簽證”。

根據目前已發現的檔案，僅僅在1938年6月至10月之間，何鳳山就向猶太人發放了1700多張“生命簽證”。

17歲的猶太青年艾瑞克在被五十多個領事館拒簽後，找到何鳳山碰運氣，結果何鳳山壹次性給了他整個家族二十多張簽證……經他拯救的猶太人，有後來成為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演奏家的海因茨、有美國前財政部長布魯蒙賽爾、現任猶太人組織秘書長的億萬富翁伊斯

雷爾……

他的行為當然逃不過納粹的眼睛，納粹以維也納領事館是猶太人房產的理由，將領事館沒收。在民國政府拒絕出資租房的情況下，何鳳山自掏腰包，租了壹套小公寓繼續辦公，堅持發放“生命簽證”，直到被民國外交部記過警告。

2000年，已經去世的何鳳山被以色列政府追授最高榮譽：國際義人，並在耶路撒冷為其建紀念碑，上書：永遠不能忘記的中國人。

事實上，我相信我們大多數人的情況，要比這個故事中的主角在當時面臨的絕境要好得多。雖然我們也難免會誠惶誠恐，會不知所措，會沈默以對。但是，我們還可以選擇有限的表達，那些躲在背後的暗槍，斷然不敢發射。

因為，有人比我們還要恐懼。歷史的長河中，輝煌會有重復，會有遺忘，

但是，人性無聲的堅持、良知的光輝，越是黑暗，越能散發出耀眼的光芒。

勿以惡小而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為。不要因為多數人跪著，就要彎下自己的膝蓋；不要因為同情有危險，就要走向違背良知的方向；不要讓利益遮蓋我們的眼睛，不要因為無法改變而同流合汙。那些懷疑光明，譏笑追求光明的聲音，從古至今，多如牛毛，光明仍在，懷疑與譏笑卻無壹例外的消失了。

生活的理想就是為了理想的生活。如果不能山呼海嘯，那我們就只需等待。用壹言壹行為踐行正義者、為保持良知者壯膽助威，總有那麼壹天，貌似強大的會倒下，貌似永恒的會演滅。妳看歷史鏡面。

不作惡，且苟活。

# 誠實當學張學良

文 / 王淦生

提及張學良，不免讓人心生無限感慨。1936年，這位才華橫溢且正值當年的“少帥”，激於民族大義，為了促蔣抗日，毅然發動“西安事變”。之後，又親自將蔣介石送至南京，卻自此陷入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囚禁生活。他的光明磊落成就了他，也斷送了他。

張學良盡管飽受屈辱，但對造成自己悲劇命運的蔣介石並無過多的怨言，在壹些重大歷史問題上亦未諉過於蔣介石，而是壹直勇敢地承擔己責——其誠實的品質世所罕見。

眾所周知，東北是在“九壹八”事變時因張學良的不抵抗而失守的。張學良當時為何不抵抗？各種公開的說法是：他執行了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。蔣介石當時實行的是“攘外必先安內”的政策，正忙著對付共產黨和紅軍，下達不抵抗令也在情理之中。建國後相當長的壹段時間內，我們很多歷史教材亦持這壹觀點。然而，歷史老人卻同我們開了壹個大大的玩笑：“九壹八”事變的真相並非如此。事情的真相正是由當事人張學良自己揭開的。

首先有張學良的日記為證。1945年8月，抗

戰勝利。東北父老對張學良的處境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注，使張大為感動。次年1月3日，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：“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沒起來，胡思亂想，想到東北的人們對於我個人的問題。這不單是感情的問題了，真叫我慚愧無地，難過得了不得。說起抗戰階段，我是毫無貢獻……九壹八事變，判斷的錯誤，應付的錯誤，致使‘不抵抗’，而使東北同胞水深火熱十四年。今天他們對我如此的熱誠，這可真叫我太難過了！”張學良的這段近乎“懺悔”的日記說得再明白不過了——正是由於他在戰略戰術上的壹錯再錯，才導致他“九壹八”事變中的“不抵抗”和東北的失守。

其次，張學良在多種場合壹再表明：“九壹八”事變中蔣介石未給他下過不抵抗命令。1990年，張學良在接受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的訪談時就曾“鄭重聲明”：“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。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，不是的，絕對不是的。”他說，當時，因為奉天與日本人的關係很緊張，發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幾件事情。那時我就有了關於日本方面

的情報，說日本人要來挑釁，想借著挑釁來擴大雙方的矛盾。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。我之所以下達不抵抗的命令，是為了避免跟日方發生衝突，日本人來挑釁，妳就離開它，躲開它。當唐德剛談到“我們已經聽了50多年了，都是這個說法，都說是蔣公給妳的指令”的時候，張學良連連表示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不是的。”“這事不關政府的事，也不關蔣公的事。”不因個人恩怨而杜撰歷史，張學良磊落的情懷由此可見壹斑。

1991年5月28日，張學良在紐約接受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等人訪談時再次公開表明：“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。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，我沒有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，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，不給他們提供擴大戰事的借口。‘打不還手，罵不還口’是我下的指令，與蔣介石無關。”

在“九壹八”事變這件事上，國人幾乎罵了蔣介石大半個世紀，說蔣介石沈冤莫白壹點也不過分。如果張學良不主動去澄清事實真相，這只黑鍋老孫恐怕還得壹直背下去。因不抵抗而失去東北

三省，張學良的過失不小。但如果他不自己去捅開這段塵封的歷史，他的過失有誰知曉？況且少帥發動“西安事變”，已經成為國人心目中的大英雄，他又何苦自損“光輝形象”？

按照很多人的做法，他可以保持緘默，閉口不談這件事；如果實在要談的話，亦可順應“歷史結論”，把所有責任推到蔣介石身上，反正已經“死無對證”。這樣既可以不與已經“蓋棺論定”的歷史較勁，又可借機泄壹泄被剝奪自由的怨氣，何樂而不為？

翻出這段舊事來咀嚼，實因感動於張學良坦蕩磊落的襟懷。尊重歷史，敢作敢當；不諉過，敢擔責——這樣的人我們實在見得太少了，敢站出來為自己當年的罪孽承擔責任的人依然罕見。

所幸張學良沒有去打“死老虎”，沒有順應“蓋棺論定”的“史實”，而是勇敢地把“九壹八”事變的真相告訴了世人，毅然擔當起屬於自己的那份責任，即使可能為此而受到世人的非議也在所不惜。

這是對歷史的敬重，是對故人的敬重，更是對天地良心的敬重。

# 湖南人為啥不會搞事情了？

文 / 劉念國

湖南古代大部分地區壹直是蠻荒之地、少數民族的地盤，只有長江南岸、洞庭湖平原那壹塊，漢人經營得多壹些。

邊緣地區自然機會不多，山高皇帝遠造個反都掀不起多大浪，人才難冒頭，再怎麼蹦達也是群眾演員的角色。

所以湖南在古代其實不怎麼受中央待見，到清中期也壹樣，兩湖地區行政中心在湖北武昌，湖南聽湖北的，夾在廣州中間姥姥不疼舅舅不愛。

湖南是由多個盆地組成的，嶽陽到長沙是壹個相對獨立區域。

所以長毛打了幾次長沙，聯合創始人肖王爺，被湖南騾子壹炮轟死後，嚇得頭也不回，就到別處刷經驗和金錢去了。

於是湖南成為南方對抗長毛的大後方，挖了第壹桶金。

之後，逐鹿天下打通南北，大家喜歡走四川、江西，北伐軍北上也寧肯主要走江西或者沿海而上。

總之沒人會選擇從湖南走，湖南成了人見人繞路的坑，除了300多年前吳三桂試過壹次，可走到嶽陽就跪了——不要說平西王，連後來牛逼哄哄的倭軍都在湖南吃足了苦頭。

總之湖南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傳承，決定了它能有獨立性又有競爭性，旁邊的省份要麼如貴州太山地難抱團起勢，要麼如江西太坦蕩，難起家守成。

這樣壹來，人見人繞的硬骨頭反倒成了太極圖的中心，成為各派勢力較勁的舞臺，誰強大要出頭就先往湖南伸腳試水，但就是很難站穩。

這給了湖南本土勢力充足的自我意識和發揮空間，成為壹塊誰也不怵的是非之地。

亂世出英雄，所以湖南人露臉刷存在感的机会來了。

到了近代，大變局的套路是從南方來的，尤其是廣東地區變成了強勢文化輸出點，湖南壹下就站在鏡頭中心了！

加上湖南人近代突出自我意識和敢為人先，當年聯省自治，湖南不但叫得兇也做得最積極，獨立憲法都搗鼓出來了，甚至還規定了民間持槍自由。

最後上壹碗重要配菜，歷史上元初、明初、清初各朝天下初定後，湖南作為掃尾工程，中央政府壹般採取屠戮政策。

湖南局部地區多次遭到滅絕性打擊，所以很多地區人口移民為主。移民雜糅，壹來交流多守舊少，二來紛爭多，弱肉強食，比肌肉、比刀把子，這樣壹來，霸蠻的個性更加突出。

所謂霸蠻，不是頭腦發熱的不顧後果，而是曾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胡漢民評價黃興：“黃興是個標準的‘湖南騾子’，更隱藏‘老子不信邪’的脾氣，其雄健不可壹世。”——關鍵詞是“雄健”，是舍我其誰、敢搞事情的氣魄。

那麼問題來了，湖南曾成批湧現出高質量的人才群體，善搞事，能搞事，高能為核，人才團聚。

主要有晚清以曾國藩、左宗棠、郭嵩燾為代表的經世派和洋務派群體，清末民初以黃興、蔡鐸、宋教仁為代表的辛亥革命誌士群體，革命年代以毛爺、少奇、弼時為代表的領導人群體和改革開放後以耀邦、榕基為代表的領導人群體。

可為什麼到今天，湖南人卻不會搞事情、不能搞事情、不敢搞事情，鮮見搞事群體了？